

戎狄文化的探索 (下)

王克林

四、戎狄文化的面貌与内涵

历史是探讨戎狄族的祖源、发展、名号之演变及社会生活方式等方面的线索。我们此前的论述已展示出一个梗概。那么,戎狄的文化面貌或内涵如何?即何种考古学文化为戎狄的遗存,就必须在历史记载的戎狄族活动地域内探求。然而戎狄族历史悠久,从黄帝时起,经夏商周三代至东周入中原的诸戎,已成为所谓“古之戎狄,今为中国”,与华夏融合了2000多年,故其文化亦可源远流长。其滥觞期文化,则与黄帝时代新石器后期遗存相当。发展期当在三代,晚期为东周。之所以如此划分,是基于对戎狄文化有一个发端、发展和变化的粗略认识。那么研究的方法,则应用纵横的方法予以考察:纵的即可上下联系弄清文化的谱系和发展变化的动向;横的则可左盼右顾,观察到每一时期文化间的互相关系。

纵的方面,在戎狄族活动的黄土高原中心所在的陕、晋、内蒙西南和甘、青东部以东地区,考古发现表明,这一地域内先秦时期的考古学文化,有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二里头(夏)文化、二里岗(商文化、殷墟文化、西周文化、东周文化)。可谓连绵不断,序列清楚。

仰韶文化的面貌,主要为半坡和庙底沟两个类型,就分布地域,前者偏西,主要集中在关中地区。后者偏东,且多集中于豫西和晋南,其文化发展阶段的晚期相当于黄帝或五帝时期。

龙山文化时期的这个地区,文化发达,遗址规模宏大,遗存内容十分丰富。然而由于所处的地域不同,故其内涵多有自身特点,大致可分为几个类型。黄土高原南面的有陶寺类型和晋西南三里桥类型;西南为陕西关中客省庄类型;东为太行山西麓的晋中类型;北为内蒙西部凉城老虎山龙山文化和晚期的伊金霍洛旗的朱开沟文化。这些各类型的龙山文化,其早期都以甗、甗等炊器为其共性,但至晚期在炊器上除继承原有甗、甗外,出现了鬲和新型的大型蛋形袋足瓮(客

省庄类型无蛋形瓮),为其与众不同的特征。

二里头文化时期(即夏时期文化),在整个黄土高原上都有丰富的遗存,但由于地域的不同,文化面貌也存在差异。高原的南面为东下冯类型,东侧属晋中类型,西侧为齐家文化遗存,北边则是朱开沟二里头四段(夏时期)文化。这些文化都普遍出现带耳或带把的单把鬲或双耳鬲、单耳缸、双耳缸。这种带把或带耳陶器造型轻盈,形制小巧精美,散发着北方草原文化的气息。所不同的是西侧的齐家文化多橘红陶,东夏时期的各文化类型则多灰陶,彩陶绝迹,陶鬲的形制多直领、大袋足。而高原北侧朱开沟等地各遗址中出现了新颖的用细泥条堆贴的蛇纹陶鬲和花边陶鬲,特别是前者在此地突然出现向南或向东拓展的迹象,大约在东周初期又倏然消失。其次蛋形三足瓮在这一阶段有了长足的发展,并在黄土高原的各遗址中成为最具文化特征的遗存。这种蛋形瓮往西在黄土高原的甘、青地区,往东在太行山东燕山南北均逐渐减少,暗示出这里当是另一文化圈,即以蛋形三足瓮为代表的文化圈。此外,又值得一提的是,在考古学文化上所反映的这里的二里头文化阶段社会经济形态,各遗址中普遍多猪骨,但到了它的中期,羊骨普遍增多,从而昭示出社会出现的变化。例如朱开沟墓葬,龙山晚期和夏初的墓葬多殉葬猪骨,从三段(夏代)的早中期开始则多殉葬羊腓骨,就是这里的社会经济由农业转向畜牧的见证^[4]。

二里岗期商文化时期是这个地区二里头(夏)文化的延续,无论是晋中,还是陕北或是内蒙,都表现出是一个文化的前后发展阶段。例如晋中太谷白燕^[15]和内蒙朱开沟二里头文化与其共存的二里岗期均相衔接,其典型器物皆以蛋形瓮和高颈肥足鬲最具代表性。例如:朱开沟的花边鬲、蛇纹鬲带纽圆腹罐、蛋形三足瓮等陶器的形制,从这里的第一阶段至五段,承传关系明显,展现出是一个文化圈的特征。但在遗存中也有不少文化因素有来自中原二里岗期商文化的特征。如朱开沟曾出土有商代铜鼎、爵和戈。陶器有

雷纹簋、弦纹圈足豆等。这正是由于地缘的相邻、黄土高原南北、东西的文化交流或传播在物质文化上的反映。

殷墟文化时期是指与殷都安阳殷墟相邻的陕、晋两省殷代的方国文化。这个地区的殷代方国遗存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现不少,由于与中原商文化有别,故而学术界都称之为北方系青铜器文化。这里仅以陕、晋为例。在黄土高原东端太行山西麓的有山西太谷白燕、忻县莲寺沟^[16]、灵石旌介、洪洞上村、石楼后兰家沟坡等^[17]、永和下辛角^[18]、柳林高红、保德林遮峪等^[19]、陕西的有吴堡县、绥德塬头村^[20]、薛家渠、后任家沟、清涧县张家圪、解家沟、寺焉村、李家崖^[21]、延川县刘家原、延长县前张罗村和淳化黑豆嘴等。遗址地点众多,但具有规模的遗址和墓葬不多,且多习见小型遗址或零星墓葬,是以上北方方国文化聚落的特点。而遗存均以北方系青铜文化见长,即既有自身方国文化的特点,如有金器、短剑、管釜兵器等,同时又有中原殷墟文化鼎、爵、觚等礼器的因素。而中原文化中也时有北方文化的遗物,如环首刀等。因此文化中“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开了中原与北方交流融合的先河。这种差别正是黄土高原上北方系青铜文化与殷墟文化性质不同,为两个文化圈的表现。

两周时期的考古资料表明,黄土高原的南面即陕西关中以东和晋南或晋东南一带,都属周王室京畿和分封列国的宗周文化。而黄土高原的中部和北侧,即内蒙古西部,西周文化因素十分稀少,这一现象表明,这一地区自殷以来,为以北方系青铜器为代表的北方民族势力的范围。由于族势的强盛,从而形成了与殷周对峙的局面,阻止了殷周王朝向北向西拓展。无独有偶,西周金文记录的周王朝对当时西北民族的诸多战事,便是这一事实最好的注脚。如《小孟鼎》铭:“王曰:孟以□□伐鬼方,□□□□执酋二人,获馘四千八百□二馘,俘人万三千八十二人,俘马□□匹,俘车卅辆,俘牛三百五十五,羊卅八”。可见北方民族人多族大,财物殷盛。

西周末年(前8世纪初),王室衰微,北方戎狄民族势力强盛,时时“侵盗暴虐中国”,致使中原“诸夏”“尊王攘夷”,联合对外,东有“齐桓公伐山戎”,西有“晋文公攘戎狄”,阻止了戎狄势力的东进南下。但囿于靠近农业区已久的戎狄,在“居夏则夏”的社会影响下,多被融合,反映在考古文化上,在黄土高原南面与诸夏杂居的戎狄,已看不出本民族原有文化的特色。但是离中原较远的高原的中部或北侧地带,在春

秋时期多还保留着北方戎狄民族文化的固有因素。如山西晋中以北的忻州地区原平县刘庄塔岗梁“代戎”墓葬^[22],和宁夏固原东周戎狄墓^[23],都还可见北方民族使用石椁葬具、墓中可见青铜器并埋葬马羊等牲畜的习俗。战国以降,中原地区的农业文化,与北方“引弓之民”的畜牧文化,有了明显的分野。

横的方面,前面所述黄土高原先秦时期考古文化的纵向概况,其横向的第一层面的仰韶文化,我们认为当与中国历史时期司马迁《史记》中的五帝时代相当。《五帝本纪》中记载黄帝“北逐荤粥”,如果把“荤粥”视为历史时期戎狄族的祖源或似与其有一定的联系,那么其文化,按推理自然就当与这个地区某一类型的仰韶文化相联系。考古资料表明,在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下,切不可漫无边际地牵强附会;但是却可以这样说,在古人眼里,戎狄族在这个地区却是很早就存在的一个群体。

第二层面的龙山文化,是中国考古学文化的铜石并用时代,其早中期与中原各文化类型无什么差异。但至晚期,在黄土高原的北侧,由于约在公元前3000年后半期,这里由温暖型逐渐向寒冷干型转变。这一变迁反映在物质文化上的表现为:龙山文化的人群生产方式逐渐从原始锄耕农业转入畜牧业。其群体也逐渐南下与农业社会接触,从而对中国古代社会、夏商周三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上述内蒙朱开沟遗址的一至四段的文化演变序列即为其例。

第三层面的二里头文化,资料表明,该地区这个阶段的文化,自晚期龙山文化以来,发生了急速的变化。表现在社会生活上,埋葬习俗中由埋葬猪骨转向多埋葬羊骨,便是当时这里人们的生计已迈入畜牧或游牧复合经济之证。生产工具的变化,铜器的使用在各遗址中均相当习见。而以鬲、甗、斚和大型盛器蛋形三足瓮为代表的陶器群,是黄土高原地区二里头文化阶段的特征。其中蛇纹鬲在这里突然发生,而后又倏然消失,这说明显然它应是外来品,即受近邻的畜牧游牧文化影响所致。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曾出土一件柄部有镂空纹饰的环首刀,这种形式的环首刀,据有的学者研究,它属“早期北方系青铜刀子”^[24],此为夏时北方畜牧或游牧(戎狄)民族文化南下的旁证。这一考古现象,可印之于文献,即历史记载的夏初“后羿代夏”——北方畜牧游牧民族南下取代夏政权的事件。

第四层面二里岗(商)文化社会面貌。第三层面揭示了二里头文化阶段已趋于畜牧(或游牧)为主的

社会,到二里岗(商)文化阶段,特别在黄土高原的北侧,人们可以看到,无论在那个方面都已畜牧(游牧)化了。首先反映在生产工具上,在朱开沟遗址第五段二里岗期上层早商文化中,曾出有青铜短剑、环首刀和兵器的铜戈、铜冑(盔)^[25]。这些铜器除戈外,均为中原商文化所不备的独具特征的北方系青铜文化戎狄族的遗存。其次,具有北方民族特征的蛇纹鬲、蛋形三足瓮继续为人们所习用,且数量有所增加。此外,这一层面所反映的黄土高原与周围文化的关系,主要是南面与商文化的关系,其文化影响之大小,则由距离远近而定。在与商距离较近的晋南、晋东南、晋中或陕西关中以东影响较大,而较远的黄土高原北侧内蒙一带影响则相对较小,但影响也是明显的,如上列举的朱开沟的铜戈,援部瘦长,与河南偃师商城的铜戈一致^[26]。这里的雷纹陶簋和一些陶鬲、陶豆,也都具有中原二里岗上层之风格。

第五层面为殷墟文化。这一阶段文化的时空界限,是指殷武丁前后的前一层面商文化的沿袭和发展。在地域上,是黄河中游太行山西麓沿太岳山、吕梁山以西,远至陕西泾水流域的淳化,地跨晋、陕两省这一东西狭长地段的北方系青铜器文化。在地理位置上,它涵盖北方畜牧或游牧民族的北方系青铜器文化。基于气候的变迁和北方民族势力强大等社会因素,促使其文化由商初居黄河上游下段的内蒙,拓展到晋陕接壤的黄河两岸,而及晋南和晋西南。因而在考古文化上,在这个地区很少见到有殷墟时期的文化遗存。所以文化遗存的中心在石楼、清涧一带,遗存不但丰富,而且种类也多,为北方系青铜器文化发达期。

文化遗存,主要以北方系青铜器见长。器形可见有兵器的短剑、管銎斧、管銎戈、管銎矛和军事防御装备的冑、靴形模型等。生活用具有环首刀、羊首刀、鹿首刀和其他动物图案的兽首刀等,和蛙首、蛇头等装饰的匕、勺。装饰品有黄金弓形头饰、金耳环和青铜弓形器等。这些具北方系青铜器文化特征的器物群,均为中原殷墟文化所不备。

生活用品的陶器,仍然是承继这里具有传统北方民族所习用的蛇纹鬲、肥足鬲和蛋形三足瓮等具有戎狄特征的器皿。陕西清涧李家崖殷代晚期遗址出土一件带有“鬼”字的陶片^[27],由于地望与甲骨文记载“鬼方”活动地域相合,故推测清涧一带当是殷代鬼方活动的地方,那么李家崖遗址及其文化,就应该是戎狄别种鬼方的遗存。

精神文化同样在李家崖遗址中有所反映。曾发现

有一件石雕人像骷髅石刻,这一遗物的性质,笔者曾在拙稿《卐图符号源流考》一文中指出,它是黄土高原西侧地区,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以来对骷髅人像艺术的沿袭,其性质是贯穿中亚草原畜牧或游牧民族一种典型的原始萨满宗教艺术^[28]。因此,李家崖这一骷髅人像石刻是文化遗存的人们共同体的族属为畜牧游牧族一个重要物证。此外,表现为同一族的遗物,是器物群中别具特色的金耳环,它先后在黄土高原的中部从东到西的山西太谷白燕、洪洞上村、永和下辛角村、陕西的绥德塬头村、淳化县具里豆嘴村的北方系青铜器文化中出土,器物的形制都属于一个类型,而文化的相同其族属自然同为一个族属。

这些北方系青铜文化器物群,显示了其独特的文化性质和族属中原殷商文化对其影响也是十分明显的。在北方系青铜器文化分布所在地东边的灵石旌介、忻县莲寺沟、石楼、永和、保德、陕西清涧、绥德和淳化等地,各遗址和墓葬,均出土有殷式铜鼎、爵、尊、觚、豆等礼器,这些青铜器有的是文化交流所得,有的是从战争掠夺。有的当是地方铸造,如北方系青铜器中习见的带铜铃的铜豆、铜觚等,反映出北方青铜文化与殷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所以,这一层面黄土高原地带殷墟时期的北方系青铜器文化,由所处地域的集中,遗存丰富且有很强烈的个性或地域特征或民族性,故可谓北方系青铜器文化繁盛期。

第六层面的两周文化,即西周和东周文化。

(1) 西周文化。在黄土高原可分为南、中、北三个部分。其南部主要是周先世自周太王古公亶父以来,在陕西渭水流域岐山周原建国立邦的宗周文化,和黄河以东的汾河流域晋南周王朝所分封的晋国、杨国、霍国等封国的西周文化。这两个地区,由于自夏商以来与北方系青铜文化中心相邻,所以反映在文化上,也多涵盖或保留着不少北方青铜文化的因素。如上述黄土高原地区龙山文化晚期以来的大型、直口、蓝纹蛋形三足瓮在这里也保留着,并且还很盛行,但由于时代偏晚,又接近农业区,故其形式有所变化。例如晋国西周阶段的蛋形瓮,器体变小,为一般的小型盛器。在渭水流域西周文化大本营的周原发现的蛋形瓮,除小型的外,尚有器体硕大者,显示这类大型三足瓮,是贮藏粮食的盛器和以后“仓”、“稟”类的鼻祖或祖型。晋南曲沃曲村晋国晋侯墓出土的青铜兔尊^[29],尤带有浓厚的北方草原文化的风味。

黄土高原的中部地区,主要是指山西吕梁山和陕西清涧至泾水上游淳化以北,子午岭以东,这一带少

有宗周文化,有之也是夏商以来的北方青铜文化的延续。其文化遗存,主要是清涧李家崖遗址出土的联裆鬲、陶豆、簋等陶器和清涧寺焉村发现的翼形镂空铜铎,它们与西安沣西张家坡西周早期同类器相似^[30]。

墓葬方面。清涧李家崖发现的殷末周初石棺葬,系为石板围砌似“椁壁”的小孩瓮棺葬^[31]。这种石筑墓,是北方民族文化区特有葬具,为中原地区所少见。石棺葬在这个地区起源很早,盛行于甘青地区新石器时代后期。例如陕西华县元君庙仰韶文化第458号墓的石棺葬^[32],陕西神木石峁龙山文化墓的砾石垒筑石板铺垫的石棺墓,便是这种具有地域民族特色的葬具。尔后在黄土高原西侧的先周文化区极为盛行。例如地接陇东的陕西泾水上游长武县碾子坡的石棺墓,表明周先世承袭了这里西戎的葬俗。在这里的240座先周墓中,便有数十座石棺墓^[33]。

黄土高原的北部地区。20世纪的后半段考古工作表明,在长城以北的内蒙古地区,西周遗存发现很少,说明殷周时期这个地区是北方民族的势力所在,周初《小孟鼎》铭记载的“伐鬼方”等金文记载便是这一事实之实录。

(2) 东周文化。黄土高原地区的北方系青铜器文化,作为系列文化其时虽有沿袭,但文化面貌与殷周时期相比则迥然有别。在其南沿与华夏农业区接近,由于杂处北方民族已多融合,故而很难看到殷周时典型的青铜短剑、金耳饰等北方青铜文化的遗存。但却仍有不少北方草原气息的铜器在这里的东周墓中出土,例如山西晋南闻喜上郭村春秋早期墓发现的底部带铜铃的铜盘^[34]。侯马上马村春秋墓发现的铜钺、管釜^[35]。晋东南春秋赤狄所在的长子和潞城东周墓中的管釜斧、矛上多有鸟蛇搏斗的纹饰^[36]。仍带有吕梁山一线殷周时期的北方系青铜器文化的遗风。

黄土高原中部东端山西晋中太原金胜村春秋晚期251号大墓出土的镂空管釜戈,圆锥鸟首铜钺,竖耳铜钺,高足釜,卧牛钮鼎盖^[37]及晋北浑源李峪村解放前后出土的一批具有北方草原畜牧民族的狩猎纹铜壶,兽首钮鼎盖,带耳铜豆都具有春秋时期南北方华夏与戎狄文化融合的特色^[38]。又原平刘庄塔岗梁东周墓地出土的靴形铜钺,附耳环钮方形铜豆、鸣哨、包金铁柄剑、无柄管釜矛^[39],表现了春秋时期北方系青铜文化的发展与进步。在这处墓地的22座墓中就有18座石椁墓(椁室均系砾石堆砌)。距此墓地不远的定襄中霍也发现有石椁墓^[40]。这种石筑椁室葬具,为黄土高原西部族系不同的西周和先周文化,是与石棺墓有

别的另一种石筑葬具形式。

东周文化层面,所展现北方系青铜器文化或民族文化特征的遗存,是黄土高原西部甘、青地区的洞室屈肢葬的墓葬习俗。

有关东周时期的洞室墓和屈肢葬,前者在西北甘青地区发现较多。从新石器到青铜时代都有一种形制呈“凸”字和“日”字形的墓葬^[41]。后者屈肢葬,是当时一种重要的墓葬习俗。例如青海乐都马厂齐家文化的墓葬,就有不少屈肢葬墓^[42],尔后在陕西关中两周秦国墓葬中流行的屈肢葬,就是沿袭这里自古以来戎人的葬俗。其来源,是从古人席地而坐,以臀着地的“箕踞”而来。民族学的资料证明,世界上很多地方都曾流行过屈肢葬,在我国岷江上游川、甘交界处的氏人,就长期保留此俗。《龙州府志》曾载:番人“埋葬无棺槨。死,亲子负尸往穴地,盘其足,坐如生时,用土石掩覆安埋”^[43]。可见屈肢葬,在我国起源于黄土高原西部甘、青地区,是这里新石器以来经营畜牧或游牧生产的氏羌和西戎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一种葬俗。

通过对我国黄土高原历史和文化的纵横论述和排比,就比较容易根据这物化了的线索判断厘定,这个地区哪一种考古文化为戎的文化,哪一种文化为狄的遗存,为学术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信息或凭证。

五、戎狄文化归属的推定

有关戎狄文化的问题,早在20世纪初和其以后的八九十年代,我国不少学者多有议论,但其所论及其切入点,尚嫌不确。兹由前面各节对黄土高原考古学文化纵横的比较研究,可予戎狄文化如下定义:具有地域性和民族性,为中原华夏农业文明的夏商周文化所不备的,地处我国东部黄土高原,以蛋形三足瓮为代表的系列,具有明显的北方系青铜器文化,葬俗以石棺葬、屈肢葬为特征的遗存。

戎狄族在我国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而有史可考,有物可证,大约是从新石器时代后期,龙山文化晚期起,历经夏商周三代,迄至秦汉仍连绵不竭。因此历代戎狄的文化,则多随社会的发展有其时代性和地域性的差别。

关于戎、狄族文化的区别或差异,笔者认为戎和狄是同祖源,但在历史长河中发展而成不同种系或别种。如果以陕西泾水上游接近甘肃东部的子午岭为界,在黄土高原东部,其器物群以系列型的陶器——蛋形三足瓮、螺旋式金耳环和墓葬以石椁为特征的北

方系青铜器文化,应属于鬼方和其后裔狄族的文化遗存。其在黄土高原西部,即以单把鬲、双耳鬲、单耳缸、双耳缸等器物群和石棺墓、土洞墓和屈肢葬为代表文化,为戎狄的文化遗存。这一文化之分界,为戎、狄的区别。司马迁的《史记·五帝本纪》中对上古戎狄之祖源说“北逐荤粥”、《匈奴列传》的“唐虞以上有戎、獫狁”,《索隐》曰:“唐虞已上曰山戎,亦曰獫粥,夏曰淳维,殷曰鬼方,周曰獫狁”,王国维补充说:“入春秋后则始谓之戎,继号曰狄,战国以降又称之曰胡,曰匈奴”^[44]。这些对戎狄的祖源和其族系的发展流向而导致的名号之不同,究其原因,正是出于戎狄族的社会经济(畜牧游牧)随时迁徙,居无定所决定。故而对其族名,则多随时移名,随地立号,极其复杂。

有关戎狄名号或互称问题,大约在西周末年幽王时由犬戎之乱,西戎大举东进,戎、狄才合二而一统称为戎狄。《史记·索隐》西周对戎狄的称号为“周曰獫狁”。此獫狁正是黄土高原西部的犬戎,史称“西犬戎”的一支别种允姓之戎的允戎,这允姓之戎由东进入中原农业区后,在陕东、晋西北、晋南与原住地之狄族或诸狄,即《左传》所记的“怀姓九宗”杂处融合为一。由于史家不察其情,将原来不同种姓之戎和狄混合统称为戎狄。《左传》襄公十四年载范宣子“将执戎子驹支,……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离于瓜州”,正是西边的瓜州允姓之戎东进,与晋地诸夏诸狄杂居融合,自然其族名皆以狄称之。

我们根据考古文化北方系青铜器文化圈分布的面、点和各自地域特征,及其文化的发展动向,解释了戎狄名号的演变。若再以此为基点,上溯探索甲骨文所载春秋戎狄之先,周时獫狁,商时鬼方,夏时淳维,唐虞时山戎,黄帝时荤粥的族源,则将对中国古代民族史和东亚中亚古代民族史的研究,会有所裨益的。

[14][25][26] 《内蒙古朱开沟遗址》,《考古学报》1988年第3期。

[15] 《山西太谷白燕遗址第一地点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第3期。

[16] 沈振中《忻县莲寺沟出土的青铜器》,《文物》1972年第4期。

[17] 郭勇《石楼后兰东沟发现商代铜器简报》,《文物》1962年第4、5期。

[18] 杨绍舜《山西永和发现殷代铜器》,《考古》1977年第5期。

[19] 吴振录《保德县发现殷代青铜器》,《文物》1972年第4期。

[20] 黑光等《陕西绥德县塬头村发现一批窖藏商代青铜器》,《文物》1975年第2期。

[21] 吕智儒《陕西清涧县李家崖古城址简报》,《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1期。

[22] 山西忻州地区文管处《原平县刘庄塔岗东周墓》,《文物》1986年第11期。

[23] 罗丰等《宁夏固原近年发现的北方系青铜器》,《考古》1990年第5期。

[24] 林沄《早期北方系青铜器的几个年代问题》,《林沄学术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7] 吕智荣《陕西清涧李家城址陶文考释》,《文博》1987年第3期。

[28] 王克林《𠂔图像符号源流考》,《文博》1995年第3期。

[29] 《天马一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二次发掘》,《文物》1994年第1期。

[30] 《沔区发掘报告》。

[31] 《陕西清涧李家崖古代墓葬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1期。

[32] 《元君庙墓地》。

[33] 胡原盈《南郊碾子坡先周墓葬和西周墓葬》,《中国考古学论丛》,科学出版社,1993年。

[34] 朱华《闻喜上郭村古墓群试掘》,《三晋考古》第1辑。

[35] 《侯马上马村东周墓发掘》,《考古》1963年第5期。

[36] 《山西长子东周墓》,《考古学报》1984年第4期。

[37] 《太原晋国赵卿墓》,文物出版社,1996年。

[38] 李夏廷《闻喜上郭村古墓群试掘》,《三晋考古》第1辑。

[39] 《山西原平刘庄塔岗梁东周墓》,《文物季刊》1998年第1期。

[40] 《定襄县中霍村东周墓发掘报告》,《文物》1997年第5期。

[41] 谢端琚《试论我国早期土洞墓》,《考古》1987年第12期。

[42] 《青海柳湾》,文物出版社,1984年。

[43] 江鸿《屈肢葬和奴隶制》,《民族论丛》先秦民族史专集,四川民族研究主办,1982年。

[44] 王国维《鬼方昆夷獫狁考》,《观堂集林》卷十三。

(作者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

栏目主持/赵曙光